

CBJJ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二十世纪

常森 著

先秦散文研究反思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

常 森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常森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8

ISBN 7-301-05769-5

I. 二… II. 常… III. 古典散文-文学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IV. 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1100 号

书 名: 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反思

著作责任者: 常 森 著

责任编辑: 胡双宝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769-5/I·0604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版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300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一版 200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9.00 元

目 次

引 言	(1)
上 二十世纪前先秦散文研究之简要回顾	(5)
第一章 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6)
第一节 关于诸子之兴起	(6)
第二节 关于诸子之要旨及特色	(7)
第三节 关于诸子之文学	(8)
第四节 关于史传作品记言记事之分职	(10)
第五节 关于《尚书》、《春秋》等史传著作之高于诸子	(11)
第六节 关于《左传》等史传著作之文学	(11)
第二章 唐宋及唐宋以后	(13)
第一节 唐宋及唐宋以后先秦散文研究之总体特点	(13)
第二节 唐刘知几论《左传》等先秦史传文	(19)
第三节 南宋陈騏《文则》论《檀弓》、《考工记》、《左传》等 先秦散文	(20)
第四节 明吴讷《文章辨体》论先秦散文	(22)
第五节 清前期金人瑞批注《天下才子必读书》论先秦散文	(24)
第六节 清后期刘熙载《艺概·文概》论先秦散文	(28)
第三章 二十世纪以前先秦散文研究的总体特点	(31)
中 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平议	(37)
第一章 自世纪之初迄建国	(41)
第一节 探寻和奠定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的理念和范式	(41)
一 “历史”观念的成熟以及“文学”观念的探寻	(41)
二 地域时势决定论：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 解释模式之一	(53)

三	郑振铎、游国恩与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的重要理念	(60)
第二节	梁启超考释古籍所实践的方法:边缘化、核心化、系统化	(68)
一	文献材料的边缘化	(72)
二	核心化以及核心比照系统的建立	(82)
三	系统化	(89)
第三节	钱穆关于先秦诸子学术的“积说”和“整统”	(98)
第二章	自建国迄世纪末	(108)
第一节	二十世纪后半期大陆先秦散文研究平议	(112)
一	“会通”古今中外:钱钟书的前秦散文研究	(112)
二	立足“汉语文章的实际”及“史的发展”:郭预衡、牛鸿恩等学者的先秦散文研究	(119)
三	对朴学之实证精神的继承和呼唤:杨伯峻、胡念贻、方铭等学者的先秦散文研究	(123)
四	阮忠、宋效永、孙以昭、郑杰文等学者的专书研究	(129)
五	探索以及偏失:刘毓庆、傅修延等学者的先秦散文研究	(137)
第二节	二十世纪后半期台港先秦散文研究平议	(159)
一	比兴和小品:钱穆对先秦散文的独特关怀	(160)
二	传统方法与成果的集大成:张高评之《左传》研究	(163)
三	王怀成之《韩非子》散文艺术研究	(169)
第三节	二十世纪后半期先秦散文研究的基本范式	(174)
一	存在决定意识: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解释模式之二	(174)
二	元素分析法:谭家健及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解释模式之三	(181)
第四节	闻一多及其反面:先秦文学研究中的文化学视角以及所谓“三重论证法”	(189)
一	简要回顾:成果、方法及基本特点	(189)
二	二十世纪先秦文学之文化学研究平议	(195)

1. 闻一多借文化学方法,发掘出大量超越文本字面 内涵的信息	(195)
2. 闻、郑在初创时候的粗陋	(204)
3. 闻、郑采用文化学方法的根本特点和立足点	(211)
4. 叶舒宪等:走向闻一多的反面	(214)
 下 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之整体平议	(249)
第一章 基本判断	(251)
第二章 被泯没的历史性	(258)
第一节 作为历史性概念集合的“散文”	(258)
第二节 回到“先秦散文”的历史存在	(262)
第三节 散文的历史发展:边缘化或者核心化	(278)
第三章 被遗忘的“作者预期中的读者”	(306)
第一节 被作者导引、利用的读者的心理预期或反应	(306)
第二节 影响创作过程及其产品的读者	(310)
第三节 被读者拖进夹缝的著者	(314)
 简短的结语	(317)
 主要参考书目	(319)
 后 记	(324)

引 言

如果从战国时代算起的话,人们研究先秦散文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行程中,刚刚过去的百年无疑最值得关注。但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专著深刻剖析这百年研究的风云激荡。我们甚至连深刻展示其一角一隅的单篇论文都没有。没有谁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一百年之间,一代代学人走过什么样的路;没有谁告诉我们,在这条路上走过以及依然在这条路上走着的前辈学者,有哪些不该被历史遗忘;没有谁告诉我们,这些前辈学人如何确立了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的理念;没有谁告诉我们,他们采用过哪些重要范式或方法;没有人告诉我们,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哪些重要的偏蔽;更没有人告诉我们,肩负着这沉重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如何走好今后的路。

本书将以传统与现代文学观念的冲突为背景,深入探讨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理念艰难确立的过程;将对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范式,诸如地理时势决定论、存在决定意识的理念、元素分析法、文化人类学研究法,以及作为考释方法的边缘化、核心化、系统化等,做认真的提炼和深入的反思(同时还将论及传统的评价点);将细致剖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部分学者将文化人类学高标为国学研究第三重证据以及第三重论证法所蕴含的研究理念的深刻变异,以探讨学界在这一方面进行科学定位的原则和方法;还将深入揭示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的根本缺陷,诸如背离历史性原则、无视“预期中的读者”对创作过程及风格的深远影响等,以谋求在某些根本方面引导今后的研究走上正确的路。

说到底,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立足当前学术发展,审视以往百年有哪些著论或方法对当下仍有价值,进而从某些重要方面启示今后前进的门径和方向,至少是要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

研讨。本书的重点虽在二十世纪先秦散文研究的历史进退和起伏上,但绝不满足于简单地按时间顺序来罗列这一时期、这一方面的成果。因此,本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甚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论。就某种意义、某些方面而言,它或者可以说是一部比较系统、深入、完整的专论。

这样的立意决定着,本书将要清醒反思百年学人走过的路,将要在充分肯定百年研究成就及进展的同时,以巨大的学术良知和勇气,正视此间的衰颓,将以不同的形式揭示我们做过的或者正在做的重复无效、没有意义甚至导致祸害的工作,将凸显那些事实上更具学术价值但几乎被人们淡忘的学者及其成果。而由于先秦散文既是中国文学、史学、哲学的重要源头、母体,又参与构建了中国文学、史学及哲学的第一座高峰,所以本书的撰著不仅是先秦两汉散文研究领域开拓、创新的努力,而且或能对中国文学、史学及哲学研究,带来某些重要的启发。

但是,评论二十世纪尤其是建国之后的学术研究,却是一件让人为难的事。因为这绝非可以善意争鸣、坦率交流的年代。《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两千多年以前,老子送孔子之言,有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笔者固非聪明深察、博辩广大之人,但批评则不免于“议人”,且其迹近于“发人之恶”,所以犹豫再三。《易·象》有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施批评便显得褊狭,必陷德不厚之讥,所以犹豫再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徐复观曾深切指明批评的必要及难处,云:“在学问上,能发现某些权威犯有错误的,仅有极少数人才可以做到;一般人,只能在权威圈子里打斤斗。……首先立说的权威,假定继续做学问,则对自己立说的漏洞,必能有所发现。假使由立说者自己把漏洞亲口亲笔表达出来,这该可以让一般人少走许多冤枉路。但近百年来的风气决不如此,不仅绝少自己发现自己错误之事,并且对他人所指出的错误,要便是‘概不答辩’,以保持自己的身份。要便是以‘游辞’为‘遁辞’等方法,使问题更陷入魔障。甚至促使受到卵翼的帮派后生出来为他呐喊,或运用政治力量给对方以打击。这是中国在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上,经常陷于泥淖之中的重大原因之

一。”〔1〕的确,学术要健康地发展,就不能不提倡善意而坦率的批评。笔者愿本学术良知,尽可能写出自己对二十世纪先秦散文乃至古代文学研究的真实认知。知我罪我,不敢让焉。

〔1〕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三版改名自序第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上 二十世纪前先秦散文研究之简要回顾

二十世纪以前,人们对先秦散文的研究并不系统,亦并不完全自觉。然而那时很多零散、简要的批评或论析,却曾对后世自觉、系统的研究,发挥过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对它们加以回顾,从历史及学理两方面看,都是必不可少的事情。

但此时,有关先秦散文研究的材料非常丰富、多样,涉及的问题又异常广博。所以这里只能简略检讨一下当时人们考虑、探讨的重要问题及其特色;系于问题,而不完全系于著家或时代。

第一章 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自先秦历汉、魏至唐代,有关先秦散文研究的文献资料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先秦诸子之兴起、要旨、特色,以及先秦诸子之文学;二、关于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分职,关于《尚书》、《春秋》之高于诸子,以及《左传》等史传著作之文学。彼时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对后世先秦散文研究发挥过相当重要的影响和规范作用。

第一节 关于诸子之兴起

陈柱《中国散文史》以为,诸子之兴,原因不外三种:一是本诸古学,二是原乎官守,三是因于时世。^{〔1〕}现在看来,古往今来几乎所有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均未能超出这三个方面;其渊源所自,则主要是《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篇以及《汉书·艺文志》。

《天下》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学术批评著作。它对诸子的源流、主旨和特点,提出了极富启发意义的判断。在探讨诸子兴起的原因时,它主要是从“本乎古学”这一角度入手。譬如其论关尹、老聃之学,云:“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此外它论墨翟、禽滑釐之学,论宋钘、尹文之学,论彭蒙、田骈、慎到之学,论庄周之学等,大体都用这种模式。

《要略》篇对诸子兴起问题的探讨,则主要是从“因于时世”这一角度入手。譬如其论《管子》云:“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

〔1〕 陈柱《中国散文史》第41页,东方出版社,1996。

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近人胡适评《要略》之说云:“此所论列,虽间有考之未精,然其大旨,以为学术之兴,皆本于世变之所急,其说最近理。”胡适又认为此说足破九流出于王官之陋说。〔1〕

《要略》这一看法,跟《汉书·艺文志》实有部分内容相通。《汉志》有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但《汉志》又以为诸子之兴,原乎古之官守。所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云云。

第二节 关于诸子之要旨及特色

《庄子·天下》篇除溯求诸家渊源外,主要内容是讨论各家各派的学术指归和特色。譬如它论庄子,谓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今人曹聚仁以为“这些话说明了庄子之所以为庄子者”。〔2〕《天下》篇凡此类论断,对剖析诸子各家之精神和艺术,有相当重要的启发意义。

此后《荀子·解蔽》篇极简洁、明快地评鹭各家长短,云:“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再后,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著《论六家要旨》,而深受黄老道家学说影响,于儒、墨、阴阳、名、法、道德六家之中,最推扬道家。但总的说来,其于六家学术的评鹭非常准确,亦非常深刻。例如它剖判阴阳家

〔1〕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第594页,中华书局,1991。

〔2〕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第13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之优劣，曰：“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汉志》称阴阳家者流，“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这种看法显然是对《论六家要旨》的发展。

再往下至南朝齐梁间，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可以算是研讨诸子学术及艺术的又一重要文献。它总论诸子学术云：“逮及七国力政，俊乂蜂起，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尹文课名实之符，野老治国于地利，骀子养政于天文，申商刀锯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勋，尸佼兼总于杂术，青史曲缀以街谈，承流而枝附者，不可胜算；并飞辩以驰术，履禄而馀荣矣。”凡此之类，均能抓住诸子学术的某些本质。

第三节 关于诸子之文学

战国及汉唐时期一些散见的论说，曾对后人把握诸子的文学特质发挥过重要影响。《天下》篇出自庄周后学。它对《庄子》的文学特点有异常透辟、精审的把握。所谓“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倦，不以觭见之也”，所谓“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所谓“其书虽瑰玮，而连犴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淑诡可观”等，把庄子散文的特点抉发得入木三分，可以说是探讨庄子艺术空前绝后的经典言论。故尔后治《庄子》者，常常引为典据。嗣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庄子》艺术特色，亦有精审的把握。所谓其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所谓“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所谓“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所谓“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等等，都是对《庄子》艺术的绝妙概括。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论墨子之言多不辩，云：“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

……故其言多不辩。”此后墨子之言“不辩”成了历代学者的共识。

《文心雕龙·诸子》篇概括诸子艺术，云：“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尸佼、尉繚，术通而文钝；鹖冠绵绵，亟发深言；鬼谷眇眇，每环奥义；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韩非著博喻之富，吕氏鉴远而体周，淮南泛采而文丽。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文）之大略也。”这是全面检讨诸子文学的重要文字。它或者兼论诸子的内质和外在语言表现，如理与辞、事与言、气与采、心与辞、意与语、术与文、鉴与体等；或者单论其一端，如文子之于情、尹文之于辞、慎到之于理、韩非之于喻等。总之，它以只言片语穷形尽相，确实为知言之奥论。

《诸子》篇尤其重视诸子的内涵，故综括诸子“本体”云：“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综，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其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同时斥责商、韩六虱五蠹之论为弃孝废仁，公孙白马孤犊之说为辞巧而理拙，以为“洽闻之士，宜撮纲要，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刘勰持论如此，自有其道理。先秦诸子事实上确不以纯粹意义上的“能文”为指归，阅读诸子文章当然不应拘于文字表层。梁萧统《文选》为中国现有最早的诗文总集，而弃诸子不取，且谓“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其所见跟刘勰称诸子为“入道见志之书”，从根本上看完全一致。要之在合乎近现代理念的“散文”自觉前，所谓“以立意为宗”实为中国散文的特质。^{〔1〕}“览华食实”，理固然也。惟《文选》所反映的，是人们在比较纯粹的“文学”观念自觉之际对先秦诸子的反思。它对诸子的排抑正是对这种比较纯粹的“文学”观念的张扬。而刘勰不取这种文学观念，故亦不因“不以能文为本”而拒斥诸子。

此外，刘勰视诸子极富艺术趣味的夸张和想像为“踳驳”，这一点跟文学关涉甚深，值得注意。《诸子》篇如是云：“《礼记·月令》，取乎

〔1〕 连唐宋八大家之文亦以此为本质，故或谓：“持萧统之说以衡，虽唐宋韩、柳、欧、苏、曾、王八家之文，亦不得以厕文学之林；以事出于沉思，而义不归乎翰藻，盖以立意谓宗，不以能文为本者也。”参阅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第2页，中华书局，1993。

吕氏之纪,三年问丧,写乎荀子之书;此纯粹之类也。若乃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惠施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淮南》有倾天折地之说;此踳驳之类也。”〔1〕刘勰所视为踳驳者,从近现代文学理念看,恰是最值得重视的文学要素之一。其评断之陋谬,跟他以原道、征圣、宗经为核心的基本文学思想有关。这一点,刘勰对《离骚》的评论可以作为旁证。《文心雕龙·辨骚》篇一方面惊叹《离骚》为“奇文郁起”,并感慨“楚人之多才”;一方面又明确指斥《离骚》、《天问》、《招魂》等诗中“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娥女”,以及“康回倾地,夷羿殢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等“异乎经典”的四事,称之为诡异、谲怪、夸诞。由此明显可见刘勰拒斥超现实想像和夸张,主要是因为它们“异乎经典”。刘勰的看法反映了经学价值观念高高在上的超越性姿态,在以经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统社会中具有极大的代表性。

第四节 关于史传作品记言记事之分职

《礼记·玉藻》云: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2〕《汉书》因袭此说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这种看法,为后世广泛接受。《文心雕龙·史传》篇云:“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唐刘知几《史通·疑古》篇云:“盖古之史氏,区分有二焉:一曰记言,二曰记事。而古人所学,以言为首。”其《载言》篇亦云:“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嗣后对此提出异见的学者并不多见。

乾嘉著名学者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其《书教上》云:“……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

〔1〕按刘勰所谓“蜗角有伏尸之战”,出自《庄子·则阳》,实为戴晋人对梁王语。

〔2〕《礼记》“左”、“右”二字互讹。郑玄注云:“其书《春秋》、《尚书》俱在,谓右史书动为《春秋》,左史书言为《尚书》也。”见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录校勘记),1980。

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言语本质上是行为之一端,强分言、行只是着眼于表面。因此,不管章学诚对《春秋》、《左传》的看法是否正确,他对记言记事的论断都可以说是异常深刻的。遗憾的是这一论断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迄今常见于篇籍,由此亦可见其影响深远。

第五节 关于《尚书》、《春秋》等史传著作之高于诸子

在较早时期,史传引起的重视虽不及诸子广泛,然而一般论断却明显把包括《尚书》、《春秋》在内的《五经》置于诸子之上。扬雄《法言·寡见》篇云:“或问:‘《五经》有辩乎?’曰:‘惟《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舍斯,辩亦小矣。’”其《吾子》篇更云:“舍舟航而济乎渚者,未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未矣。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扬雄以“济乎道”为指归,把《五经》抬到诸子之上,这凸显了汉人崇尚经术的观念。换句话可以说,扬雄是依据《尚书》、《春秋》等史传著作在经学传统中的特别内涵和地位,将其凌驾于诸子之上。这种做法,再次说明了在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自觉以前,一般学者评价作品的最高标准乃在于经学价值层面。

第六节 关于《左传》等史传著作之文学

汉初,“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春秋繁露》对《春秋》笔法有部分归纳和阐发,如指出《春秋》书法有常辞、变辞等等。^{〔1〕}晋代杜预《春秋左传序》则结合《左传·成公十四年》所谓:“《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而

〔1〕 参阅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第42—44页,商务印书馆,1991。